

齐陈骏

河西史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拥军

河西史研究

齐陈骏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3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ISBN 7-5423-0122-5

K·7

定价：3.95元

前 言

我虽生长江南，然来西北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个春秋，使我对大西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因为我是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所以对西北地区的历史有极其强烈的兴趣。从古代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的氏族、羌族，到现在为建设家乡而进行着辛勤劳动的各族人民；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凿，到今日即将建成的直通中亚的铁路，无不迴萦在我的心头。古边塞的豪壮辽阔，石窟寺佛教艺术的绚丽多姿，更使我敬佩西北古代先民们的勇敢和智慧。抱着这一深切的感情，于是我在教学之余，写过一些有关西北古代史的文章，有专题的探讨，也有综合的论述；有自己实地考察的收获，也有的是读史的心得，想以此报答大西北对我这个江南游子的哺育。

这本集子中所收的十四篇文章，是从我历年所写的西北古代史文章中抽选出来的。其中十一篇是我单独撰写的，有三篇是我在教学中与一些同志共同写成的。在共同写成的三篇后面，都注出他们的名字，以誌良好合作的历史。在这十四篇文章中，有许多篇曾在公开的或内部的杂志中发表过，《唐代西北的屯田》和《李晟及其西凉政权》则是新近写成的。

将这十四篇文章收集到一起，我惊奇的发现：以前所写有关古代西北地区史的文章，主要还是集中在河西走廊这块土地上。细想起来，这大概也是自己生活在甘肃，并对敦煌学有特别感情的缘故吧！所以，我就将这本集子定名为《河西史研究》，使之

更能如实地反映我这三十年来的工作情况。

研究西北地区史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将对于我们今天开发和建设西北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鼓舞起为建设自己家乡的西北地区人民的热情。我的这个集子，当然不敢说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我希望通过这个集子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出更多的有关研究西北、研究甘肃的著作，使西部史学更加繁荣起来。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学识浅陋，文章中可能存在有不少的疏漏、缺点甚至错误，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齐陈骏

一九八八年仲冬于

兰州大学

目 录

序言	(1)
古代河西的兴衰	(1)
丝路考察纪略	(23)
河西历代人口简述	(42)
敦煌沿革与人口	(57)
敦煌沿革与人口(续)	(73)
略述三国时期曹魏对河西的经营	(98)
略论张轨和前凉张氏政权	(109)
氏人吕光和他的后凉政权	(130)
李嵩与西凉政权	(145)
裴矩与隋通西域	(164)
隋唐西北的屯田	(178)
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	(242)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 义	(259)
关于高台县骆驼城遗址的一些问题	(273)

古代河西的兴衰

一

河西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又因它夹在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多公里，宽百公里或仅数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犹如一条长廊，故称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历史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尚书》的《舜典》、《禹贡》等篇。其中有三危、黑水等名，后人指为今张掖黑河及敦煌三危山，其说不一定可信。但根据考古发掘，河西早有人类在此生息。仅武威地区，现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就有皇娘娘台、鸳鸯池、营盘梁、张家台、罗家湾、海藏寺、瓦罐滩、二坝、三角城、小崖子、王景寨等十余处。在酒泉地区，则有闻名中外的“火烧沟类型文化”。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在山丹、民乐、酒泉、玉门等地均有发现。

战国以前的河西，是羌戎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到战国、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塞种和匈奴是河西的主人。后来月氏强大，赶走乌孙，成为河西的统治者。1957年在玉门骊马城新石器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人们推测是秦汉以前乌孙或月氏在这里活动的遗物。

月氏占有河西后，一度非常强盛。大约在秦朝时，匈奴头曼单于曾把太子冒顿送至月氏作为人质。后来冒顿逃归，杀父自立，打败月氏，迫使月氏西逾葱岭，进入今阿富汗境内。残留在河西

的部分号称小月氏。自此匈奴遂占有整个河西走廊，分由右贤王部下的休屠王、浑邪王管辖。至今闻名中外的祁连山，据说是匈奴人命名的。“祁连”即“天”的意思，因其高入云霄，故名祁连山^①。凉州武威县，原名姑臧，据说亦为匈奴语“盖藏”的转音。

秦末汉初，匈奴东灭东胡，西灭月氏，南破楼兰、白羊，北服浑庾、丁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建立起东起东北，西达新疆的强大的奴隶制游牧国家，时常侵扰汉朝边境。特别是它占有河西以后，实力大为增强，直接威胁着汉王朝的腹心地区，即关陇地区。西汉初年，由于国力不强，统治者无力反击，只能采取和亲的办法，给匈奴贵族送去大量的丝织品及酒食，借以求得边境的安宁。但事实上这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他们仍是连年南下，骚扰汉境。直到武帝时，他凭借着汉初几十年休养生息而大大增强了国力，开始了对匈奴大规模的反击战。

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有三大战役：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发生在河西的这次战争，是在武帝元狩二年（前221年）。这年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出陇西，从青海的东北部进入河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俘获浑邪王的王子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公孙敖再次出击河西，霍军出北地，“涉钩薺、济居延”，再由北向南一直打到祁连山；公孙敖出陇西，可能是拟经青海，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与霍军进行南北包抄。由于公孙敖军迷路失道，未进入河西，霍军则按原定战略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考察中，我们到达了民乐县的扁都口和永固城。永固城在汉代叫汉阳城，是历代屯兵要地。在今永固城东面，有一古城遗址，当地群众叫做霍城或八卦营，说是当年霍去病屯兵的地方。自古以来，由南边进入走廊，多走扁都口一线。霍去病第一次由南边进入河西，大概就是

经过扁都口，在永固城一带屯兵完全是有可能的。

汉军的胜利，促使匈奴内部的分裂。匈奴单于迁怒于浑邪王和休屠王，欲召诛之，于是两王惧而降汉。休屠王中间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浑邪王带了四万部众入塞，被安置在陇西边五郡塞外，称“五属国”。河西自此归汉统治。汉王朝先在这里设立了武威、酒泉二郡，后又分置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四郡共辖二十五个县。

河西归汉是河西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汉为经营这一地区，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贫民和“罪犯”徙来河西。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西四郡当时有户六万一千余，口二十八万余。如果再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大约有四十万人左右。大量劳动力的进入，加以他们带来中原人民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开发。

西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则由戍边士兵所种，收获交公，衣粮由国家供给；民屯则由徙民所种，向国家交纳地租。当时屯田是很有成绩的。首先，西汉在这里曾兴修过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程。据居延发现的汉简，就有甲渠、临渠、广渠等名称，还有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史记·河渠书》也提到“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其次，是在这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汉武帝末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就是首先在边郡和居延城推广的。居延汉简有“代田仓”的名称，大概就是专门收藏代田法所获粮食的仓库。再次，从屯田的收获量来看，数量也是很大的。屯田所得粮食，除自给以外，还有剩余。有一汉简记载，元帝时内地遇灾，还曾调发居延粮食前去接济。居延如此，河西其它屯区亦应大体相似。

秦代长城没有修到河西，汉得河西后，为防止漠北的匈奴，在走廊的北边修筑了一条与走廊平行的长城。立郡之初，即筑了令居塞，从今甘肃永登县修筑到酒泉。以后，又修筑了酒泉与玉

门间、敦煌与盐泽间的边塞，在居延，还修筑了遮虏障。这次考察，在玉门关附近看到了一段保存较完好的长城，由芦苇夹沙石筑成。芦苇和沙石每层的厚度为二十到三十厘米左右。虽经二千年风雨蚀剥，这段长城还高有三米多，底亦有三米宽，顶上最宽处亦有一米左右。筑城芦苇是附近沼泽中取来的。在玉门关与阳关之间，平漠无边的戈壁上还有一条隆起的沙石垄，平均高约一市尺，当地同志也认为是汉代所筑的长城。

汉代除在河西修筑长城外，在整个军防系统中，还有关隘和烽火台的设置。关隘主要是玉门关和阳关。两关是河西通西域的两个门户。我们这次到了小方盘城和古董滩。小方盘城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定为汉代的玉门关遗址，现在保存尚好，四壁多是夯土版筑，高约十米左右，占地约六百三十多平方米。此城规模很小，是否是玉门关遗址，颇有怀疑。甘肃考古队据近年发掘，认为玉门关不在小方盘，而应在马圈湾附近。阳关遗址坐落在古董滩的高土台上，规模更小于小方盘城，现尚有夯土残留遗址。我们认为这一土台仅是汉代的一个烽火台遗址。至于阳关确切地址，尚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汉代烽隧遗址保存得较多的亦在敦煌，据调查，敦煌境内有七十余座。我们见到的，以小方盘城西约二公里处的一座较为完好，也由芦苇夹土坯筑城，残存的有十三层。遗址南边有五堆柴草，都是芦苇、红柳或胡杨树枝。据居延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这些柴草应叫“积薪”。敦煌县博物馆陈列了从烽火台内取来的一束束芦苇火把，长的有二米八五，小的只几公分，这大概就是叫做“大苕”、“小苕”的报警燃料。

在汉代，移民、设郡、设防、屯垦这四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是汉代河西得以开发并有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河西地区，西汉的墓葬群也很多。张掖黑水国附近及武威乱墩子滩等地都有上千个西汉墓。在河西的大量汉墓中，曾出土

了大量的汉简、丝织品、陶、木等器物。武威磨咀子汉墓群曾出土了大批木简，其中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六十九枚木简，共有二万七千多字，是完整的九篇《仪礼》，为我国古文字及古籍校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六十二号墓出土的木质仪器式盘，是解放后第一次发现的古代天文仪器。另外还有铜饰木轺车以及十多种花纹精致、经纬细密的绢、锦、纱、罗等残片。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西汉时期的河西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窦融就是因为“河西殷富”，是个避乱“遗种”的好地方，才要求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后来被推举为河西五郡（包括金城郡）的首领。在窦融统治下的河西，光武帝曾说它是个“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区域^①。在光武帝出兵西击割据陇右的隗嚣时，窦融全力支援，在东汉王朝统一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东汉初年，窦融去洛阳以后，任延为武威太守。他在武威建立学校，奖励耕垦，兴修水利，整修武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河西当时乃是一个殷富的区域。但是，到明帝（公元58—76年）以后，开始是北匈奴的骚扰，继之是东汉王朝镇压羌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十余次战争，“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②，使河西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后汉书·地理志》所载顺帝时河西仅有四万多户，十六万多口，比西汉时减少了三分之一，可见是在逐渐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这次考察中，曾见到了许多东汉时期的墓群和文物。张骞黑水国遗址中有一大批是东汉时的墓葬，在这里出土过一些陶灶、陶鸡窝等。酒泉博物馆曾展出了东汉时期的银釉陶壶、铜连枝灯、羽人灯、神兽镜等等，造型优美，制作精巧，反映出东汉时期河西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已有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1966年发掘的武威雷台下的东汉晚期大型砖墓，出土了金、铜、铁、

玉、骨、漆、陶、石等器物二百三十一件，其中铜器一百七十二件。最精致的是一套铜铸的武装车马出行行列，有俑四十五个，马三十九匹，车十四辆，牛一头。闻名中外的铜奔马就是从这个砖墓出土的。此马一足踏飞燕，三足凌空，昂首翘尾，奔突向前，是罕见的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这座墓中出土的立俑、骑俑的身上，刻有“张氏奴”、“张氏婢”、“御奴”、“车奴”等字样，随葬的还有一座高大的釉陶楼阁，周有围墙，四角有角楼，俨然是东汉晚期的一个地主庄园。它是研究东汉晚期河西阶级关系最形象的资料。东汉晚期，战乱不止，各地豪强地主乘机兼并土地，攫取劳动力，迫使他们变成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私附和部曲，建立起所谓壁、坞、堡、垒的地主庄园，横行乡里，割据一方。魏晋时期长期的分裂割据，就是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河西地区出现这种典型的地主庄园，也就为魏晋时期的河西能出现许多割据政权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

自东汉镇压羌人战争以后，战祸频繁，河西受到极大的破坏。到曹魏初年，河西先后又有张进、黄华、麹演、伊健妓妾、元治多等的叛乱，河西大扰。明帝太和年间，仓慈为敦煌太守，史称：“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出现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⑥。这时河西的人口也急剧地下降。《三国志》无河西户口的记载，但与毗邻的金城郡相比，可知大概。东汉顺帝时，金城郡有户三千八百多户，而到曹丕称帝，苏则成为金城太守时，却是“户不满五百”了。后来苏则“内抚凋残，外鸠离散”，经多方努力，也只到达了一千户，只有东汉时的三分之一。估计河西各郡情况也应大致相似。由于战乱和豪强地主的阻挠，两汉以来繁荣的中西交通，这时也处于不绝如缕的状态之中。

西晋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短期的统一，河西也得以相对安定。据晋志记载，凉州八郡四十六县，有户三万七百，除去不属于河西的金城郡和西平郡的六千户，河西实有二万四千七百余户左右，以每户五口计，则应有十二万人。与曹魏时比较，人口显有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河西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西晋统一极其短暂，很快即进入了一个大分裂的时期。这时的河西，先后出现了五个称“凉”的政权。据现有资料来看，在前凉和前秦统治时情况较好。前凉张氏统治河西时，当时有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⑧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招来了中原大量的流民。前凉政权在其初期还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和注意兴修水利等政策，如在敦煌地区就兴建了北府渠、阳开渠、阴安渠等等，使百姓蒙受其利^⑨。因此经济情况较好。到前秦灭掉前凉，苻坚虽曾将河西七千余户“豪右”迁往关中，但又从江淮及中原地区迁来一万七千余户，从户口来说，可能比前凉还要稍多一些。这时的中西交往也比前有所发展，西域各国都曾派使者前往长安朝贡。

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被苻坚派去征讨西域的吕光在东还时占有河西，建立了后凉政权。河西自此进入长期动荡不已、灾荒连年的时代。后凉统治十分残暴，史称：凉州百姓“饥谨流亡，死者大半。”^⑩仅吕隆统治时（公元401—404年）的一次灾荒，姑臧一带饿死的就达十多万人。后凉亡后，河西出现了南凉、北凉和西凉三个并立的割据政权。这些统治者尽管口头上也说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但由于不断的混战，加以战胜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掠夺人口，广大人民被逼得流离失所，根本无法从事生产。所以到北魏取得河西时，河西已是地旷人稀，一片荒凉了。这时河西的人口，据《魏书·地形志》的记载和推算，大约亦只七千来户，比西晋又相差得很远了。从此也可见河西破坏的严重。

北魏在孝文帝时推行均田制度，对河西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

用。据隋志所载，河西三郡有户二万五千，这应当是推行均田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时的中西交通也日趋频繁，僧侣、商人、使臣往来于河西走廊的史不绝书，其著名的僧侣就有竺法护、法显、鸠摩罗什、师贤、昙无讖、昙耀、智猛等等。早在魏太武帝太延年间（公元435—440年），西域十六国使者即来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其后使者不绝，每年都有数十次之多。至于商旅往还，这时也日见增多，《周书·异域传》有“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的描写。北周时，瓜州曾发生了一次张保的变乱，据《周书·令狐整传》说，州人推波斯主张道义来主持州事。张道义可能就是一位主持与胡商交易的头面人物，让他来管理州事，瓜州胡商看来是一定很多的，贸易也一定比较繁荣。

魏晋时期的河西虽不及两汉时繁荣，留下的文物却比较多。著名的有酒泉、嘉峪关的画像墓砖及石窟寺等等。这些文物可补史籍的不足，加深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历史的认识。

嘉峪关的画像墓砖是1972年在该市新城公社跃进大队的魏晋墓中清理出来的。这些画砖多嵌在墓的前室四壁、中室东西两壁及后室的后壁上。画面多用白灰作底色，用墨线勾勒轮廓，然后用赭石、白、石黄、浅石绿、浅赭石等色填补而成。砖画反映的内容比较广阔，有反映当时农业、畜牧生产的，如耕种图中，上下画有双套牛两对，四男驾牛，前两套犁地，中二女持钵播种，后两套耨地。同今天河西地区的耕作程序基本相似。打场、扬场的砖画有好几幅，都是画农夫、农妇持杈扬场或用连枷打场，同今天河西有的地区农民打场完全一样。畜牧画中画有一牧童放着二头牛、十二头羊。现在河西的蚕桑业很少，砖画则画有采桑、蚕茧的图画，说明当时河西还有丝织业的生产。这些砖画既反映了魏晋时期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情况，也为研究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提供了形象的资料。还有一幅屯垦的砖画，上部画一骑马武官与两排持盾扛矛的武士在行进，下部画有二套牛在耕

地，前一套耕者为一短衣窄袖、宽裤、编发的少数民族。西汉以来，河西就是著名的屯田区，魏晋时期，屯垦规模虽然缩小，但割据者仍在这里屯垦则应是肯定的。两汉屯垦主要的是戍卒和徙民，画砖表明，这时少数民族人民也成了屯垦的主要劳动力了。这种变化，应是东汉中期以来周边各族人民不断内徙的结果。自那时起，河西即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区域。氐族吕光建立后凉，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北凉等政权，正是民族融合及斗争中的必然产物。河西的开发与发展，应该认为是河西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劳动所取得的成果。

除上述内容外，砖画中还出现了魏晋时期史籍中常见的称做“坞壁”的地主庄园，其中一幅还用朱红色标写出“坞”字。坞四周有高墙，坞内有高层碉楼或望楼、敌楼。坞外有半圆形的帐篷，好像是家奴的住处。砖画还反映了坞内主人在奴婢侍奉下宴饮享乐的情景，有杀牛、宰猪、烤肉、烹调、进食以及弹奏、歌舞的场面。这正是当时阶级对立的真实写照。从砖画我们可以看到，坞主既有大量的土地和牲畜，也有大量的依附农民和从事家内劳动的奴婢。东汉以来，正是由于这种自给自足，号称坞壁的地主庄园的发展，才出现了魏晋时期生产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冷落和割据政权迭兴的局面。

魏晋墓葬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是酒泉丁家闸五号墓。该墓的壁画同样也是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燕居行乐的情景。据一些同志推测，这是五凉时期一个王侯的墓葬。墓室中的壁画分天上、地下、人间三个部分。天上画的是日、月、东王公、西王母、羽人、三足鸟、九尾狐等道教仙人及神禽异兽；人间则是反映墓主生前的财富和生活享受的场面，如农牧蚕桑生产、庖厨饮宴、伎乐百戏等等。地下则是画的负重神龟。从艺术角度看，这座墓的壁画笔力刚劲，技法娴熟，比嘉峪关砖画有更高的艺术水平。这些砖画和壁画，不仅是研究这一时期河西历史的直接资料，对研

究当时的思想意识、美术音乐的历史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在这一时期的文物古迹中尤其要值得注意的是：河西从这时开始出现了许多的石窟寺。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就沿着丝路不断东传。到十六国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同时也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对现实的失望，使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此，宣扬“众生皆苦”、“屈辱忍让”、“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佛教便得以在南北流行起来。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必经通道，佛教西来，首先传到河西，到十六国时，佛教已在河西广为传播了。前凉统治时，据《魏书·释老志》所说，敦煌地区已是村坞之间多有寺塔，而到北魏取得河西，佛教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在河西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从而在这里根植生长，开放出一朵朵茂盛的佛教艺术之花。河西的石窟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艺术价值上，在全国可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

河西的石窟寺，最早有纪年可查的是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创建的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石窟的建筑形式、造像、壁画的特点是，窟内有中心塔柱和禅窟，佛像有高鼻深目的形象及有垂肩的发绺和交脚而坐的格式。这些都明显地带有印度和中亚的风味。至于壁画，则多是本生故事及佛传故事。但是，也就在这些早期的石窟中，我们也看到了道教神话中的仙人形象，如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还有伏羲、女娲、雷公、雨师等等。佛道同居于一窟，这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最有力的证据。

魏晋时期佛教虽在河西广泛流传，但从当时的墓葬中来看，却往往只有道教题材的壁画，没有佛教的题材。上述丁家闸五号墓是这样，敦煌佛爷庙新近发掘的记有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年号的一些陶片上，也都是写的“急急如律令”等道教咒语，没有佛教影响的痕迹，是否可以这样认识：佛教虽已在人世广泛流

行，但还未进入地下。在墓室中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道教神话。

尽管这次考察所见的这一时期文物大都是与佛道有关的，但决不是说在思想意识领域里佛道已占了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学。自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以后，河陇学者多来河西避难，司马光就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①前凉张氏和西凉李氏本是汉族，重视儒学自不待言，就是建立南凉的秃发乌孤，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为了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重视儒学。这批河西学者不仅为保留中原传统的儒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反过来还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如前秦时，洛阳、关中的千余生徒就是跟着河西学者胡辩学习的。北魏统一北方后，河西学者如赵逸、刘昞、胡奭、江式、阚骞、程骏、常爽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河西的儒学，一直到隋唐时期还有影响。

魏晋时期的河西古城遗址，我们只走访了高台县的骆驼城。城在高台县西约四十公里处。其城规模很大，分外廓、宫城、皇城三重，宫城在城西角，外城北面有一条小河，是黑水的支流白水河，北墙因河水侵蚀，已经塌坏，有关部门正派两台拖拉机修筑堤坎保护此城。高台县文化馆的同志认为，北凉的沮渠蒙逊曾在此建都。他们在城中曾拾得铜铍一吨多，还发现了一枚“部曲督印”。据《晋书·吕光载记》、《晋书·李玄盛传》等记载，该城不是北凉建都之处，而是沮渠男成和段业起兵发迹的地方，即建康郡的故址。

三

隋唐时期，河西进入了它经济文化的第二个迅速发展的时期。隋朝立国虽短，但河西却是它与西域交市的地方，因而颇受重视。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经大斗拔谷（即今扁都

口)进至张掖,高昌王、伊吾设等西域二十七国的首领、使者和商人,“佩金玉,被锦罽”,朝谒于焉支山。炆帝亦令张掖、武威仕女盛装欢庆,用以表示国力的强盛。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河西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尽管炆帝此举是为了要粉饰升平,夸耀外族,但如果河西当时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没有繁荣的国际贸易,要想举行这种盛会也是决不可能的。

隋末唐初的战乱,曾使河西变成了“州县萧条,户口鲜少”的地方^⑫。但经过唐初一百多年的安定局面,到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年间,却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区域。《通鉴》即曾说过,当时“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⑬。”唐在河西设有凉、甘、肃、瓜、沙五州,据新旧唐志所载,五州共有十七万二千余人,加上凉州境内等八州府的一万七千余人,整个河西当时应有人口近十九万。这一数字是两汉以后河西人口最高的数字。

唐代前期河西的繁荣,我们从唐朝在这里屯田、和籴等情况也可以看出:武则天时,陈子昂在论及甘州屯田时就说过,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收获常不减二十余万”。^⑭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开垦,“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⑮粮价大幅度的下降,只有原来数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在推行“和籴”法以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王朝从河西收购了三十七万一千余石粮食,占当年全国和籴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强。由此可见河西富庶一斑。

唐代河西的繁荣,也是与中西交通分不开的。早在隋末唐初,就有许多西域胡人入居河西。唐初割据河西的李轨,一是利用了薛举的降人;二是利用了安国人安兴贵、安修仁兄弟组织的胡人队伍而取胜的。贞观初年,玄奘西行,他在凉州曾见到了大量的西域胡商。他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⑯当时的凉州、甘州、瓜州、沙州,都